

當前中國福傳工作的幾個阻力

張景峰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教會開始忙於恢復聖堂及新堂重建，中期開始開辦男女修院，培養教會新一代的接班人，經過二十餘年的不懈努力，國內多數教區已經基本解決了「莊稼多，工人少」的狀況，神職界青黃不接的現象已經得到緩和。從二十世紀末期至今，中國教會的衆多有識之士都在思考如何更好的牧靈；如何進一步加快福傳的步伐；如何幫助青年神職、修女的再培育；如何解決主教接班人等問題。本文僅從自身牧靈與福傳的一點經驗探討在中國福傳工作的幾個阻力。

福傳是主耶穌的命令

「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谷十六15）這是教會受主耶穌的親口命令，是整個教會的使命。梵二會議說得好，教會的本質使命是傳福音，這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我們是教會的一員，每位基督徒在領洗的時候就分享了耶穌基督的先知、司祭、君王的三個職務。簡而言之，先知的職務即是要向大眾宣傳福音；司祭的職務即是向至聖天主呈獻純潔的祭品，並在天

主前恆心祈禱；君王的職務即是以僕人謙恭的心態執行仁愛。當然我們一如既往奉行這三個職務，以主耶穌為楷模的同時，也從祂那裡獲得力量。

回顧歷史上的四次福傳

溫故知新。回顧傳教士在中國幾次福傳的得失，可知當今福傳工作的阻力。按教會史學家普遍觀點，在中國歷史上外籍傳教士對中國有四次福傳。

第一次是在唐朝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六三五）即李世民登基第九年。由於他是盛世明君，採取大度包容的開放政策，基督宗教得以順利進入中國土地。從大秦景教碑及其他文獻得知，景教在中國傳了二百餘年。其後福傳失敗的主要原因：（一）過於依附朝廷。傳教士依附政治權力，有的還受封於朝廷，走上層路線。這樣會隨朝廷人士的好惡與朝廷的沉浮而消失。（二）教義和禮儀採用了許多佛教用語，所譯的經典晦澀難懂，與中國文化的精髓距離很大，沒得到絕大多數國人的認同，雖流傳二

百餘年還是被人稱為「夷教」。（三）公元九世紀末，隨著外僑和傳教士的減少，再加上阿拉伯回教徒勢力的擴大，從波斯到中國的道路被切斷，景教在中國得不到外部的大力支持，加之國內統治者的打壓、迫害，景教最終消失。

第二次在元朝，公元一二九四年，孟高維諾來中國傳教，成績卓著。不過，天主教會在元朝末期逐漸消失，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一）傳教對象：元朝天主教傳入，主要的福傳範圍是在蒙古族的上層人士中，漢人寥寥無幾，缺乏民衆基礎；當元朝被推翻，明朝對元朝蒙古族信奉的教會大肆迫害。這樣，教會也隨之消失。（二）傳教者：從十四世紀開始，回教勢力擴大。他們控制了從西方至東方的要道，許多蒙古人加入回教。同時，明朝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這樣的處境致使北京的教友們苦等孟高維諾的接班人四十年之久。道路遙遠、交通不便、自然災害等情況，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孤立無援的中國教會缺乏牧人領導，教會就逐漸窒息了。

(三) 歷史原因：當時西方教會不盡人意，教宗被充軍到法國的亞味農（一二零九年至一二七八年），教會的事務一時出現混亂，中國福傳事業多少受到影響。(四) 自然災害原因：正當元朝的中國教會福傳需要用人之際，西方一些地方受黑死病的威脅，死亡人數多達一百六十餘萬人。人心惶惶，人們無心生產和工作，經濟受其影響。同時明朝初期領導者對教會的迫害與日俱增，福傳工作變得一時暗淡無光。

第三次是一五八二年利瑪竇福傳方法和收獲。利瑪竇努力研述中國典籍，精研中國文化，與上層飽學之士以文會友。他與福傳同工受到空前的尊重，他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埋下了福傳的種子。正如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為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時所說：「利瑪竇的墓地提醒我們，麥子隱藏在地底，是為結出果實。」利瑪竇的福傳方法在中國福傳大業上有劃時代的意義，為中國教會當今福傳提供了

素材。

第四次是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後外籍傳教士的福傳。眾所周知，一八四零年中英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允許外籍傳教士自由傳教，當時眾多人士把傳教士拋頭顱灑熱血一心為中國人民的福祉，誤解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從而發生了許多教案。但有史為証，這時期至二十世紀中期傳教士的福傳策略不只在教堂內宣講，也採取了慈善服務型、文化藝術型的福傳方法。如創辦了大學（輔仁、震旦等），創辦文化刊物、孤兒院等，以推動中國教會的本地化。剛恆毅、蔡寧等人的關愛中國教會之舉，雷鳴遠神父發起的救國救民的義舉，都為中國的傳教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從以上中國歷史四次的福傳的得與失，我們可以分析當前中國福傳工作的幾個阻力。

中國文化缺乏基督信仰精神

在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中，敬事天帝的宗教信

仰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基督的福音是天主教信仰的精華，藉著她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流、會通與融合，福音能使中國傳統文化革新、淨化而展現新的活力。與此同時，基督的福音也會在中國文化中的「敬天仁民愛物」的文化底蘊中展現她的永恆價值和多采多姿的精神面貌。

無庸置疑，基督的福音在傳入中國的歷史中與中國文化也有碰撞，致使福音傳播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寸步難行，基督的教會很難成爲中國人的宗教，在中國人的心中，基督的教會仍然是歐美的基督宗教，原因是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對福傳的阻力。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教會所從事的福傳工作是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張的大背景下進行的。而在不懂得歷史真面目的一些人士心目中，基督的教會是與「帝」及「洋」分不開的，對基督的教會膽戰心驚，因爲他們認爲基督的教會可能會動搖他們的政權。所以在上層人士中常戴有色眼鏡看基督的教會。常言道，不理解源於不了解。同樣對

基督的教會也是如此。這是政治上的阻力，這一點與幾千年來的封建帝制文化有關。綜上所述，基督的教會在福傳上所遇阻力，本質源於文化，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精神的一些差異。

宗教信仰能給人生指明意義，引導人找到永恆的價值與歸宿的同時，有時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是文化中那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宗」。可是，中國人普遍的信，是以功利爲首的世俗心態的信。如在現實的環境中求發財，求升官……，這種信明顯是一種「投資行爲」，一種交易心態。而真正的信仰是你要投入進去的精神狀態，是付出，沒有世俗心的非功利追求。基督信仰是以救恩爲核心，使人活出一個更高的標準，不是爲現實的好處，而是爲靈魂的拯救。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國人的判斷標準典型是：「這有什麼用？有什麼好處？」向人傳福音時，有人會說：「唸經能當飯吃？」曾經有人爲中國呼喚民主，不是有人怒問：「民主能當飯吃？」再比如，學習有什麼用？傳統文化會答：「書

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學而優則仕」，讀書為權為利。中國人對一切的觀念往往是，注意在物質的實用意義上，而基督信仰精神基本是追求內心的平安、生命的喜樂、人生的意義、人格的完善及靈魂的得救。

基督的信仰精神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世界觀、人文修養、心靈的境界、靈魂的重生得救。而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對信仰一些庸俗化的理解，只注重現實的好處。比如：中國歷代農民呼喊的口號之一「平均主義」，如《水滸傳》的主題歌：《好漢歌》：「你有我有全都有」。但追求的不是民主，而民主的背後則是信仰。有人說中國文化裡的儒家學說是以人為本的思想，如孔子所說的「仁者愛人」，其實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等級規範下的人，是受中國專制等級文化的影響。在福音中耶穌說：「人子來不是受人服侍，而是來服侍人。」（瑪二十一28）聖經中人是天主的肖像，都是天父的兒女，無論什麼狀態的人都是平等的。總而言之，等級性的制度裡

沒有平等，沒有平等就沒有愛。當今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第一道通諭《天主是愛》，給我們指明了基督信仰的奧義：天主是愛，人為愛而生，為愛而活。這一點正是與中國文化相衝突的。

中國現今社會的無神論對福傳的阻力

從二十世紀初期無神論在中國傳播，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無神論教育在中國校園鋪天蓋地的開展，在兒童幼小的純潔心靈中播下無神的種子，讓他們在無神論的環境中成長。雖然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已經過去，但是這種階級意識和思維依然沉積在許多人的腦海之中。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很多人對宗教還存在著「談教色變」的恐懼心理。由於近年來中共對法輪功等邪教的嚴厲打擊，致使一些人對正宗的宗教也望而卻步。在中國不能像歐美國家那樣隨便傳福音，福傳的空間比較狹隘，在這種環境裡福傳，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沒有道德的尺度與永恆精神的追求，人就會把人、金錢拿來當

神崇拜。社會出現道德低落，人心惶惶的境地。唯物主義、享樂主義就會瘋狂的充斥著這個時代，社會自然就會出現更多不公平、不和諧的現象。

當今中國人在經濟掛帥、信息化社會特徵的影響之下，人的思想與價值觀念也發生了轉變。現代人的心理特徵主要表現在：一·崇尚理性；受進化論、唯物論、科學實証論對人的影響深刻。二·實用主義；注重經濟作用，注意感性與及時享樂。三·價值觀的混淆；人的內心表現出困惑、矛盾、迷茫、空虛、徬徨、無望。四·缺乏公德心；這是受中國傳統文化——小農經濟，即自給自足的觀念影響。面對以上這些問題，我們不應該悲觀。現在的社會特徵和當代中國人的心理特徵，一方面給福傳帶來挑戰，一方面也給福傳帶來機遇，只要福傳者不斷努力回應挑戰，福傳在中國大有作為。

中國教會內部的自身問題對福傳的阻力

在中國教會內確實存在著兩個不同的群體，通

常被稱為「愛國教會」和「忠貞教會」；或「地上教會」和「地下教會」、「公開教會」和「家庭教會」；「官方教會」和「非官方教會」等。由於這些不太確切的稱呼，很多人心理存在著某種偏見與誤解。我認為，稱一方為「愛國教會」，則暗含另一教會群體不愛國，他們也因此遭到了一些執政者的誤解。其實從基督的教導，我們知道每個基督徒都有愛國的義務。一九八一年二月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馬尼拉透過廣播，對中國天主教信眾發表的演說，主題是：「你們要做真正的基督徒，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此次演講中，他明確指出真正的中國基督徒必須也是愛國的中國人。「官方教會」的稱呼也不準確。「官方教會」一詞在教會中應指以教宗為首的羅馬天主教會，把「地上教會」稱為「非官方教會」有輕視之意。「地下教會」自稱為「忠貞教會」多少帶有法利塞人自以為是的味道，不言而喻，把「公開教會」視為「不忠貞教會」帶有誤判、輕視之意。從福音的啓示我們得知，忠於教宗是每位

基督徒天經地義的義務，並不是衡量信仰生活好壞的唯一標準。而愛德才可稱爲信仰生活的標準。（請參考羅十三10；格前十三）「地下教會」把自己稱爲「受苦的教會」，無庸置疑，很多人爲信仰的完整、堅貞的品格受到政府的逮捕與打壓，但不能以殉道者自居。爲主爲教會作証是理所當然的，不應自己借此炫耀，應留給天主去嘉獎。同時把「公開教會」的神職人員認爲全是爲了逃避痛苦、受政府恩惠，也不是客觀的。另外，把公開傳教的神職人員和教堂都認爲是愛國會的一份子，這也有失公允。據我所知，在中國所謂地上、地下的教會都有一些教區公開傳教的神職人員和教堂沒有成立和參加愛國會。

其實，無論地上、地下教會在中國的福傳事業上都備受艱辛，只是受苦的程度、方式不同而已。通過一些跡象表明；多數所謂「公開教會」的主教都是忠於教宗的，和教宗保持「微妙」的關係。而一些所謂「地下教會」的神職人員與政府也保持著

某種「微妙」的關係。我個人認爲，爲了消除中國教會這兩個群體內存在的偏見與誤解，應稱爲「愛國會領導的教會」，即有很多教區至少表面上都是由愛國會所領導的；「不接受愛國會領導的教會」，即有一些公開的教會沒有愛國會和所謂地下教會都屬於這一群體。這稱呼雖然不太確切，但這是中國教會內部存在的客觀事實，這樣的稱呼可能會避免以上那些稱呼所帶來的偏見和誤解，相信有利於中國教會的合一，有利於福傳事工。

爲了響應教宗關於中國教會合一的教導，所謂公開教會應該做的：一·應該尊重和學習地下教會一些神職爲維護教會的真理與見証信仰的芳表；二·盡量保護地下教會，如爲他們提供一些書籍和愛德上的幫助；三·多爲地下教會提供培養人才的機會；四·把地下教會的態度作爲自己反省的指針，勉勵自己作鹽、作光。

公開教會不應該做的：一·不能舉報、揭發地下教會；二·不能歧視、攻擊地下教會；三·不能

不顧及信仰與法典的原則。

所謂地下教會應該做的：一·應該接納公開教會的神職，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來自虔誠傳統的教友家庭，受的教育也是教會正統的思想；二·應該多了解公開教會的處境與情況；三·應該學習地上教會的一些優點。

地下教會不應該做的：一·不能把目光停滯在政府與愛國會的過去。因政府與愛國會的態度與過去在政策上有所不同；二·不能製造分裂教會的言論；三·不能以歧視的眼光對待地上教會。四·不應以牧靈為理由隨意穿梭於任何一個教區與堂區。

所謂地上、地下教會共同應該做的：一·都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牧靈與福傳事業上；二·應互相寬恕，忘記過去，避免妄加判斷與評論；三·本著團結、合一的精神為教外人樹立芳表；四·都應在教宗的教導下忠於信仰與法典的原則。福傳者自身存在的問題對福傳也構成阻力。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教會的葡萄園裡確實活躍著一群才德兼備、

不辭辛苦、任勞任怨、全力以赴的優秀福傳者，為教會的發展、福傳的進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不容迴避的是在福傳的隊伍裡也存在一些不盡人意的現象。一些福傳者深受今日社會世俗主義的影響，追名逐利，注重享受；也有些福傳者面對教會內的複雜問題一時消極怠惰，不思進取。一些福傳者多注重外在的成績而忽略了聖召的陶成；還有一些福傳者戀棧權位，忽略了基督的精神與教會的原則。面對以上的這些問題不得不反思中國神職教育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中國的修院教育為適應中國社會的新形勢和福傳的新挑戰，改革是迫在眉睫的。神職再陶成的力度應加大加深；這樣福傳事業在中國將進一步的有效推展。

中梵關係的非正常化對福傳的阻力

中國是擁有主權的最大發展中國家，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備受世界矚目。中國有香港、澳門、台灣特殊的歷史、

地理、政治現實，中國政府始終強調統一。

梵蒂岡是一個特殊形態的國家，與所有主權國家的性質有所不同。梵蒂岡既是普世天主教會的最高領導機構聖座；以福傳為目標，又是以聖座為核心的主權國家。教宗的雙重身份即他是伯多祿的繼承人，普世教會的首領，又是梵蒂岡國家的元首。正如當時台灣高雄教區單國璽樞機所言：「梵蒂岡對自己的國家地位、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皆不為教廷外交所重。」我欣賞原台灣駐梵蒂岡使節戴瑞明先生的觀點：「梵蒂岡與世俗國家的基本區別是她植根於精神和道德權威……的普世價值。」

中梵關係與所有的國際外交關係比較有所不同，有它的特殊性、複雜性、國際性。原由是中國人遍及香港、澳門、台灣，世界各地，中梵建交並不僅僅是兩國的關係。中國有自身的文化背景、特殊的歷史、特色的政治現實，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國教會內部的複雜，如愛國會的存在；自選自聖的存在；所謂地上、地下教會的存在；在中國教會之

外有黨委、政府、公安多重管理。中梵關係的進展除兩國之外，全世界的華人、普世的各國教會與國際傳媒共同的關注。梵蒂岡對中國教會的期待是信仰的自由與合一。

從一九五一年九月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與其秘書高理耀被驅逐出境，中國與聖座的關係從此中斷，並形成互相對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位期間謹慎的思考了雙方對話之路，之後的教宗保祿六世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採取了溫和的對話立場，當今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秉承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未竟遺願，為促進中梵關係而不懈努力。

很多人都有同感，中國教會內部的修和與中梵關係的正常化密切相關，是中國教會福傳的有力保障，所以中梵關係的正常化會推進中國教會的福傳事業的發展，會加快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同行的步伐，會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會為中華民族帶來福祉。

□